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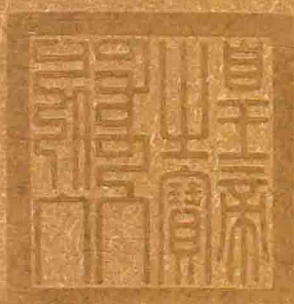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编 郭福祥◎主编

故宫出版社

清代帝后玺印谱

总目录



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帝后璽印譜

第一冊
目錄

故宮博物院編
郭福祥主編
故宮出版社出版

撰 稿 郭福祥

責任編輯 江 英

責任校對 徐 海

前言

郭福祥

就現今所留存的清代文物而言，帝后璽印雖然屬於一個比較小的藏品門類，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反映有清一代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藝術史、官廷史的重要物證，在相關的研究領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宮出版社——編注）繼出版《明清帝后寶璽》大型圖錄幾年之後，現在又推出《清代帝后璽印譜》，這是迄今為止有關清代帝后璽印資料規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披露。這裏將專門收錄清代帝后璽印的《寶斂》以及每個皇帝御用璽印的情況作一介紹，希望能為讀者閱讀此書提供一點相應的背景資料。

一、清代《寶斂》及其價值

和歷朝皇帝一樣，清代諸帝都製作有或多或少的御用璽印，這些璽印材質多樣，雕刻精細，代表了當時的工藝水平，加之又是皇帝經常鑒賞鈐用之物，故成為十分重要的官廷文

物。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朝代的更替，皇帝璽印多有流失。就清代皇帝御用璽印而言，順治以前留下來的極少，而康熙以後雖留存較多，但仍是殘缺不全。要想全面具體地了解每位皇帝御用璽印的歷史狀況，唯有將實物與《寶簏》相互參照才有可能。

所謂『寶簏』，即皇帝御用璽印的印譜，是將皇帝御用璽印收集鈐蓋，裝訂成冊，以流傳後世。在清代以前並無『寶簏』之名，也未見有將皇帝璽印製作印譜的記載：『寶簏』一詞應是乾隆皇帝的發明，寶簏製作也發軔於乾隆時期。

根據乾隆皇帝所作《匣衍記》記載：『匣衍記有三，一以誌交泰殿所藏御用國寶，一以誌端凝殿所藏御用朝珠，一以誌壽皇殿所藏御用諸璽。……復於乾隆四十六年冬，敬將聖祖、世宗常用諸璽，及朕自青宮至御極以來數十年中所用諸璽，製為寶簏匣，并豫裝空冊，亦訂為二十五層，貯於壽皇殿，以備將來依次存貯簽用，世為法守。』（《清高宗御製文餘集》卷一）據此可知寶簏的編纂製作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當時製成的寶簏雖然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但乾隆帝却命工匠製作了多個空寶簏冊，以備后繼者使用。嘉慶以後諸帝都沿襲這一成例，每當新帝即位，都要將大行皇帝的御用璽印收集在一起，統一保存，并製作《寶簏》留存。沿至清朝滅亡，各個皇帝基本都有《寶簏》存世。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宣統及慈禧的《寶簏》，成為

研究清代帝后璽印最爲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清代帝后《寶藪》基本是每位皇帝一冊，經摺裝，除慈禧和宣統《寶藪》外，其餘各帝《寶藪》的裝潢基本一樣，前後夾板用褐地黃萬字紋錦裝裱，前夾板中間留出石青色地長方形牙口，內嵌四條螭龍，螭龍中間嵌『寶藪』二字。內芯爲宣紙裝裱成的冊頁形式，每開依據所鈐寶璽的大小鈐蓋數量不同的御用璽印，大的每開一方、兩方，小的每開六方、九方或更多，每冊《寶藪》的開數依據皇帝御用璽印的多寡而定。整個《寶藪》在鈐蓋之前顯然經過精心籌度，每開預先在上下左右劃出細痕，作爲鈐印的坐標，因此《寶藪》上的印文端正規矩，不偏不斜。只有極少數是事先鈐蓋在另一張宣紙上，剪下後再貼到《寶藪》上去的，個別不太清楚的則稍作暈染修補。

《寶藪》收錄的所有印文都是用原印直接鈐蓋上去的，且絕大部分印文鈐蓋清晰，品相極佳，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按照慣例，清代每位皇帝正式製作的《寶藪》一般只有兩三份，或存於宮內，或與寶璽一起存放於景山壽皇殿。作爲當時所存的皇帝御用璽印較爲完整的匯編，清代《寶藪》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是鑒定清代皇帝御用璽印真偽的重要依據。清代每位皇帝製作的御用璽印數量多寡不一，但到底製作了多少，其大小、印文、質地、紐式如何，由於檔案的缺失都無從查考。尤其

是近代以後，中國陷於內憂外患之中，皇帝御用寶璽有的從宮裏散出佚失，想單從現藏實物全面了解皇帝御用寶璽的全貌已不太可能。而這些《寶璽》則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收錄了盡管不是全部但是絕大部分的皇帝璽印，成為公認的鑒定清代皇帝御用璽印的重要依據。

其次是鑒定皇帝御筆書畫真偽的重要依據。清代皇帝都十分重視自身文化素質的培養和提高，書畫是其中的必修內容，政事之餘經常揮毫潑墨，留下了大量作品。這些作品最後大多被裝裱成冊、卷、軸等不同形式保存起來，其上多鈐蓋寶璽。由於歷史原因，清代皇帝的御筆書畫作品有的也同樣散落出宮，現在逐漸現身於社會收藏界。對於這些御筆書畫作品真偽的判定，驗證其中所鈐御用璽印是否為真迹是一個重要方面。而《寶璽》正可與之相互比勘，從而確定作品上鈐蓋的印文是否為真迹，並進而為這些作品價值的判定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是研究清代皇帝思想的重要資料。《寶璽》中所著錄的御用璽印的許多璽文都經過皇帝欽定，就其內容而言，隱含着深刻的寓意，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在反映帝后思想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正如乾隆皇帝所說：『夫天子宸章，擇言鑄璽，以示自警，正也。』這些璽文或出自被封建帝王奉為天條的儒家經典，或出自歷代詩文中的名篇佳句，或出自皇帝自己所作的詩文，都是有感而發的，真實地反映了皇帝們的情趣和喜好，與皇帝當時的思想和行為有着密切關係。翻閱這些《寶璽》，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一代帝王的思想軌迹和心路歷程。

二、二十五寶

在浩瀚的中國古代文物中，倘若真要從中找出最能代表皇帝權力的物件來，恐怕非御寶莫屬。御寶是國家和皇權的象徵，秘藏於皇宮之內。在民間，想一睹風采而又無法實現的願望，加之種種誘人的傳說，使之變得撲朔迷離，神秘異常。其實，御寶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歷史上都有製作，只不過大多隨着王朝的更替盡被損毀而已。只有作為中國封建制度最後階段的清朝的御寶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來，這就是清代乾隆皇帝欽定的『二十五寶』。

清代在乾隆以前，一直沒有明確的關於御寶的定制，代表皇權的國家御寶根據統治的實際需要隨用隨製，因此，清前期御寶的數目是不斷變化的。乾隆帝繼位之後，右文稽古，表章經史，取得了蔚為壯觀的成就。在他統治期間，依據實際統治的需要，對國家各種制度重新釐定改革，形成了一套程式，後世多沿襲不改，因而乾隆朝所製定的重要典章制度遂成為有清一代的固定模式。在御寶制度方面，乾隆帝亦汰繁就簡，匡誤釐新，進行了頗有建樹的工作。

首先，乾隆帝對他繼位以前的御寶情況進行了一系列考察，指出了以往對國寶失實的記載和錯誤的認識，尤其是《大清會典》中的某些錯誤。如在記載失實方面，乾隆發現康熙朝《大清會典》記載共有御寶二十九方，宮內收藏六方，內庫收藏二十三方，但實際上，乾隆

時已有御寶達三十九方之多，并且都貯藏在交泰殿中，《大清會典》中記述的御寶數目和收藏地點都與實際狀況不符。同時對某些御寶的認識也有錯誤的地方，比如《會典》中說『皇帝奉天之寶』就是傳國璽，兩郊大祀及聖節官中告天青詞使用，就是錯誤的，與歷史事實根本不符。因為清代大祀只用祝版而不用寶，聖壽節時官中也從未有過告天之事，這完全是纂修《會典》諸臣的想當然。更有甚者，把『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一璽也儲於交泰殿內，而且還放在正中，乾隆認為『於義未當』。由此可見，至乾隆初年，清代國家御寶制度已比較混亂。記載失實，用途不明，認識錯誤，實有重新釐定之必要。

基於此，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乾隆皇帝對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皇帝御寶重新考證排列，將御寶總數定為二十五方，仍舊貯存在交泰殿中，并製成寶譜，以流傳後世。重新排定後的二十五寶比以前《大清會典》所記簡化了許多，每一方御寶後都注明了用途和使用的範圍，情況如下：

『大清受命之寶』，以章皇序；『皇帝奉天之寶』，以章奉若；『大清嗣天子寶』，以章繼繩；『皇帝之寶』，以布詔赦；『皇帝之寶』，以肅法駕；『天子之寶』，以祀百神；『皇帝尊親之寶』，以薦徽號；『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皇帝行寶』，以頒賜賚；『皇帝信寶』，以徵戎伍；『天子行寶』，以冊外蠻；『天子信寶』，以命殊方；『敬天勤民之寶』，

以飭覲吏；『制誥之寶』，以諭臣僚；『救命之寶』，以鈐誥敕；『垂訓之寶』，以揚國憲；『命德之寶』，以獎忠良；『欽文之璽』，以重文教；『表章經史之寶』，以崇古訓；『巡狩天下之寶』，以從省方；『討罪安民之寶』，以張征伐；『制馭六師之寶』，以整戎行；『敕正萬邦之寶』，以誥外國；『敕正萬民之寶』，以誥四方；『廣運之寶』，以謹封識。（參見《清史稿》卷一〇四卷）

二十五寶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和囊括了皇帝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各個方面。發布軍政誥令，需鈐用與之相關的御寶，體現出皇帝御寶使用的嚴肅性。乾隆皇帝在重新厘定御寶制度時，之所以要將象征皇帝權力的御寶數目定為二十五，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定寶數之時，密用姬周故事，默禱上蒼，祈我國家若得仰蒙，總佑二十五代之長。』乾隆帝並沒有去空想大清皇統萬代永昌，只是希望能夠達到二十五代，這是非常實際的想法。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乾隆帝又指授儒臣製定滿文文字的篆法，并及时將滿文篆法推廣應用到寶印上。原來，在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所定的二十五寶中，只有青玉『皇帝之寶』為滿文篆書，其餘的二十四寶都是漢文篆書，滿文楷體。爲了使御寶寶文中的滿、漢文字字體取得一致，乾隆特別頒詔給內閣：『國家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考二十有五，向兼清漢文。漢文皆用篆體，清文有專用篆體者，亦有即用本字者。今國書經朕指授

篆法，宜用之於國寶。內有青玉「皇帝之寶」，本系清文篆文，乃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先代相承，傳爲世守者，不宜輕易，其檀香「皇帝之寶」以下二十一寶則朝儀綸綍所常用者，宜從新定。清文篆體，一律改鑄。」（《大清會典》卷六三）根據這一諭旨，內閣遂將各寶寶文中的滿文遵照指授篆法用玉箸篆先寫出草稿，呈給乾隆帝御覽審批，皇帝批准後由欽天監選擇良辰吉日，到時將御寶從官中文泰殿取出改刻。

這樣，乾隆十一年所定的二十五寶中，除青玉「皇帝之寶」爲滿文篆書，「大清受命之寶」、「皇帝奉天之寶」、「大清嗣天子寶」爲漢文篆書，滿文本字之外，其餘二十一寶的寶文全部改刻爲漢、滿篆書的形式。

二十五寶平時秘藏於紫禁城交泰殿內，儲存於寶箱內，每寶貯於一箱，整齊排列在交泰殿御座兩側和背後。整個箱架外罩織金龍紋錦套。箱架爲木質朱漆，四足三彎腿，腿間花牙雕二龍戲珠紋，上面四周有欄杆，接頭用銅鍍金飾件鉚合。大寶箱木質朱漆，黃綾裱裏。上蓋正中嵌銅鍍金火焰寶珠一，正面爲彩繪正龍，其餘三面皆彩繪雙龍戲珠，正面上部刻填金「乾隆年製」四字。大寶箱內有小寶箱，也是木質，四周爲素金漆，黃綾表裏。小寶箱內有印池，依據御寶大小而製，印池內有寶褥、寶墊，御寶即放置在寶褥內。整個結構與乾隆所說的「襲以重盂，承以髹几」正相吻合。使用時由內閣請示皇帝，經許可才准予使用。

以上為現存清代二十五寶的來龍去脈。二十五寶自乾隆釐定後，傳至宣統末年，其數目和使用範圍再沒有變更過。

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御寶的徵信作用，將其作為國家的象徵物，皇帝治理天下的憑證。誠如乾隆帝所說：『蓋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經綸，莫重於國寶』。而清代的二十五寶則是現存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皇帝御寶，不但是我們認識皇帝御寶極為難得的樣本，更是反映清代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典章文物，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現在已是國寶級的文物。

二十五寶質地有金、玉、檀木，印紐有交龍、盤龍、蹲龍，不但體量碩大，而且雕制精美細膩，形象生動；不但是官廷印章的代表作品，同時也是清代雕刻尤其是玉器雕刻的代表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三、康熙璽印

康熙帝玄燁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他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治了大量璽印，成為反映其一生閑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實物。這些璽印基本上都著錄在康熙《寶藪》中，計一一九方。當然，這並不是康熙御用璽印的全部，如故宮所藏的『墨圖書』兩件，外皮均為鑲銅黑漆木套，內部皆為四節銅套管，除裝有璽印外，還有印泥、墨水、組合文具等

物。其中一件所裝套印計六方，分別爲『怡情』、『幾暇』、『五雲』、『體元主人』、『太平』花押、『封』；另一件套印爲『稽古右文』、『康熙』、『萬機餘暇』、『體元主人』、『太平』花押、『封』、『致化』、『歸一』等。這兩組套印在康熙《寶斂》中都沒有著錄。

關於康熙御用璽印的製作情況，在相關的文獻中可見零星的記述。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張誠曾受康熙皇帝之命與傳教士安多、蘇霖等進官教授康熙數學知識，因此得以參觀養心殿，在那裏他曾仔細觀察了其室內陳設，包括康熙帝的御用璽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還見到皇上的大部分印璽，都放在極爲精緻的黃袱印匣中。裏面的印章大小不一，種類各異，有瑪瑙、白玉、碧玉、水晶等，上刻文字大半是漢文。我只見一顆上面鑄有兩種文字，韃靼文的音爲「翁察、克魯、切、車尼亞庫、加邦尼、巴帕伊」，意思是：廣大無外大政之寶。有些印章上面還有一個形如子彈的印紐，兩條龍蟠着中間的篆文印名。』（《張誠日記》）此事發生在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可知此時康熙已經製作了相當數量的璽印。檔案中也有康熙製作璽印的記載，如：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怡親王交六獸紐黃壽山石「體元主人」圖書一方、雙龍紐白玉「萬機餘暇」圖書一方、檀香木「敬天勤民」圖書一方。奉旨：白玉圖書上「萬機餘暇」字磨平，將檀香木圖書上「敬天勤民」字砣做在白玉圖書上，其檀香木圖書不必動。再將白玉圖書上「萬機餘暇」字照「體元主人」圖書式樣另尋壽山石補做一方，欽此。於

二月初四日刻得收貯螭紐壽山石「萬機餘暇」圖書一方，并原交「體元主人」圖書一方，怡親王呈進訖。三月初一日砣做得雙龍白玉「敬天勤民」圖書一方，隨象牙頂錦匣，怡親王呈進訖。七月二十五日，原交檀香木「敬天勤民」圖書一方，首領太監蘇培盛持去入在大寶箱內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從上引檔案可知，康熙御用璽印有壽山石、玉、檀香木等質地，其中的六獸紐『體元主人』印爲田黃石，是康熙常用小璽，而後改刻的螭紐『萬機餘暇』印則是康熙時就已經雕好印紐放在活計庫中的備用之物。

康熙時期寶璽的製作量陡增，這與康熙本人對文化的濃厚興趣有很大關係。康熙皇帝對書法十分喜愛，政事之餘經常揮毫潑墨，留下了大量作品。這些作品最後都被裝裱成冊、卷、軸等不同形式保存起來，其上多鈐蓋寶璽。對於不同的裝裱形式，鈐用的寶璽也有所不同。比如冊一般開本較小，用寶時或在首頁鈐『康熙御筆之寶』，或在末頁鈐兩方小璽，小璽的組合也基本是固定的，如『體元主人』和『萬機餘暇』、『緝熙敬止』和『保合太和』、『體元主人』和『稽古右文之章』、『康熙』和『稽古右文』、『康熙宸翰』和『戒之在得』等。卷縱幅較小，其上鈐用的寶璽也大多較小，或在前單鈐一方『康熙御筆之寶』，或前鈐一引首章，后鈐二壓角章。引首通常有『勤民』、『惜寸陰』、『鴻藻』、『中和』等，壓角章除前面提到的組合外，還有『幾暇怡情』和『兆民賴之』、『無聲無臭』和『耄期不

倦』等組合。至於軸，尺度比冊、卷要大，故選擇大小適中的寶璽鈐蓋，一般引首、壓角俱全。引首章主要有『佩文齋』、『淵鑒齋』、『日鏡雲伸』、『三無九有』、『坦坦蕩蕩』等，壓角章主要有『康熙宸翰』和『稽古右文之章』、『體元主人』和『萬幾餘暇』、『康熙宸翰』和『保合太和』、『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五味在和』和『淵鑒揮毫』等組合。至於像『敬天勤民』、『惟堯則之』這樣的大璽，雖然在康熙《寶藪》中注明『隨便御筆大字上可用』，但實際上很少鈐用，在《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著錄的康熙御筆中，只有康熙二十八年冬至的『御臨董其昌書老人星賦軸』一件鈐『敬天勤民』璽，其他如『惟堯則之』等則未見鈐用。但在反映康熙思想方面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遺憾的是，由於晚清的動蕩，康熙御用璽印絕大多數散落於民間和海外。最近幾年屢屢出現在海內外的拍賣場上，如二〇〇一年九月，法國巴黎一家拍賣公司拍賣的一套康熙皇帝的御用璽印中就包括『康熙宸翰、戒之在得』連珠印、『康熙宸翰、稽古右文』連珠印、『康熙宸翰』、『戒之在得』、『保合太和』、『佩文齋』、『暢春』、『中和』各一方及『景運耆年』、『坦坦蕩蕩』各兩方等十二方，其質地有碧玉、白玉、青玉、壽山石等，其紐爲圓雕動物和瑞獸，共裝於一錦匣內，錦匣裱糊精細，爲宮廷原裝。又如二〇〇二年四月和二〇〇三年七月北京華辰拍賣有限公司拍賣過三方，其中朱文『戒之在得』和白文

『七旬清健』為康熙皇帝晚年的御用對印，均壽山石，質地溫潤細膩，平頂浮雕雙螭龍博古紐，雕工精緻。碧玉質的『康熙御筆之寶』則為交龍紐，龍身瘦勁無鱗，背部龍鰭參差，兩龍身體盤繞之狀甚明顯，龍頭微昂，平視前方，神態威猛張揚，系典型的清早期交龍紐風格。將這些實物與康熙《寶藪》相互參合，基本可以弄清康熙御用璽印的基本面貌。

四、雍正璽印

雍正皇帝在歷史上是一位富有傳奇性的人物，他在位的雍正時期承上啓下，在康乾盛世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出色的才華、剛強的性格、傳奇式的政治生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在他的御用璽印中也有所反映。我們迄今尚未發現雍正《寶藪》，但幸運的是大部分的雍正璽印完好地保存了下來。而在清官造辦處活計檔中，也保存了非常豐富的製作雍正璽印的資料。實物和檔案兩相對照，使我們能夠對其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從現有資料分析，雍正璽印的製作大約始於雍正被封和碩雍親王爵號，受賜圓明園的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大致經歷了三個高峰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康熙四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故宮現存這一時期的寶璽計五十餘方。有名號璽如『胤禛之章』、『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寶』、『和碩雍親王寶』、『雍親王寶』、『破塵居士』、『圓明主人』

等；有齋堂璽如『竹梅煙舍』、『學書草堂』、『樂山書院』、『朗吟閣』、『洗桐山房』、『深柳讀書邨』、『煮字亭』、『芝蘭居』、『花圃』、『松柏室』、『謙齋』、『五福堂』、『御賜朗吟閣寶』、『芝蘭室』、『敬持齋』、『圓明園』等；有記事及吉言成語璽如『娛耕織』、『清可』、『禪悅』、『泉石雲林』、『高山流水』、『嘯歌』、『冰壺秋月』、『任運』、『自在禪』、『放情物外』、『進德』、『問芳』、『得妙』、『山水趣』、『適興』、『越力』、『博聞約禮』、『墨池清興』、『溪雲』、『若木一枝』、『臨池』、『朗吟閣書畫記』、『朗吟珍賞』、『恭臨皇父御筆』等。此時雍正帝還是一位普通皇子，并未過多參與政事，他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賜邸圓明園度過的。故名號和齋堂璽中大部分都與圓明園有關，而記事吉言璽也多記述他在圓明園內的活動，如欣賞書畫、臨池潑墨、園林游藝等。第二個時期為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雍正即位後不久，便開始大量製作御用璽印。據清官活計檔記載，從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開始至十月，雍正帝便不斷向造辦處下達製作任務，其中最集中的有三次：正月二十三日命製『雍正敕命之寶』等寶璽十方，至四月十九日全部完成；五月十七日命製『雍正御筆之寶』等寶璽四十三方，九月十四日完成；五月二十日命製『朝乾夕惕』等寶璽二十二方，七月二十五日完成。初步統計，這一年共製『雍正御筆之寶』五方、『雍正敕命之寶』四方、『雍正御覽之寶』四方、『雍正親賢之寶』四方、